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龙门雕像再研究

作为佛利尔美术馆龙门雕像溯源研究的延伸，常青考察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龙门雕像，以及据传出自龙门的雕像。通过对其图像、风格、来源地、真伪甚至周边环境等因素的探讨，为我们溯源流失文物——特别是流失的不可移动文物，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我们掌握的细化信息越多，接近石窟原貌的可能性就越大。溯源西方藏品中的龙门雕像，即为这项细化工作的重要一环。

在西方学者调查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余波之后的二十世纪初，这一著名石窟寺的雕像开始频频遭盗凿，流散于商人和藏家之间。龙门雕像以及据传出自龙门的雕像，在一九一八年首次入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下文简称大都会），它们自此成为各展览及学术出版物的主题。二〇〇六年，作为对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龙门雕像研究的延伸，笔者有幸考察了藏于大都会的十六尊与龙门有关的雕像^①。研

究西方所藏龙门雕像的学者通常关注特定的图像及风格特征，以此强调来源地及真伪问题，本文在尝试阐明大都会藏品源流时将会兼及这两方面。

大都会有两尊雕像可在龙门石窟中探寻出它们的原初位置。一尊是佛陀弟子迦叶的头像（图二）。虽然前辈学者们确认迦叶头像出自龙门，但对其确切位置仍存疑惑。龙门较早的雕刻通常位于西山北段及中段。洞窟有多种编号方式：一九〇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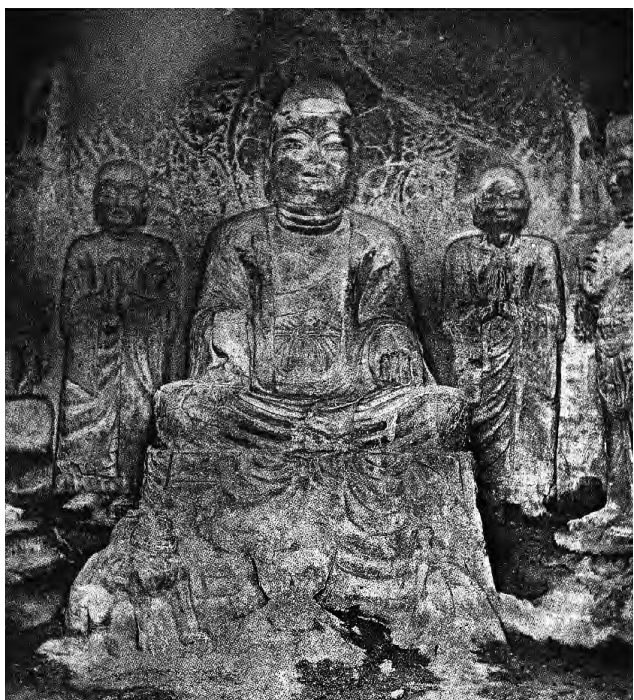
Revisiting the Longmen Sculpture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原刊于 ORIENTATIONS 英文版
2007年1~2月期

<http://www.cnki.net>
作者 Chang Qing (常青) 为美国
达拉斯亚洲艺术博物馆研究员



法国汉学家沙畹 (Edouard E. Chavannes, 公元一六八五—一九一八年) 将主要洞窟由北至南按字母编号, 以 A (潜溪寺) 开始, 以 Y (极南洞) 结束²⁰。虽然当代学者多次对洞窟及佛龕重新编号, 但他们仍遵循类似的方法, 即以由北向南为序编号。一九六〇年当这尊弟子头像入藏大都会时, 即有学者观察到其与沙畹一九〇九年出版的《北支那考古图谱》插图 V 窟中心主尊坐佛左胁侍立姿弟子的头部极为相似 (图二)。一九六五年, 大都会东方艺术馆助理策展人周方 (Fong Chow) 认识到 V 窟即药方洞, 位



于大卢舍那佛与古阳洞之间, 并进一步确认该头像为迦叶头像²¹。据龙门石窟研究所 (今龙门石窟研究院) 研究员王振国介绍, 药方洞内流失的迦叶头像受损部位高五十三厘米 (图三)。这一数据与大都会所藏迦叶头像尺寸恰好匹配, 由此可证实其确实出自龙门药方洞²²。

遗憾的是, V 窟造成了一定的误解。部分学者将『V』释读为罗马数字五, 并由此假定该头像是出自龙门第五窟。根据日本学者常盘大定 (公元一八七〇—一九四五年) 和关野贞 (公元一八六八—

下 (图二)
一佛二弟子造像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
北齐, 公元 6 世纪下半叶
石灰岩

(图片采自 Edouard E. Chavannes,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Paris, 1909, plates part I, no.350)

上 (图一)
迦叶头像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
北齐, 公元 6 世纪下半叶
石灰岩

高 53.3 厘米, 宽 37.8 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1960.73.1)

一九三五年)的编号体系,『第五窟』实际对应的是唐麟德二年(公元六六五年)开凿的敬善寺。一九九四年,龙门石窟研究所将药方洞重新编号为第一三八一号窟^[5]。

迦叶头像具有古代老僧方颐、微笑、深皱纹的特点。一九八一年当此尊头像在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展出时,被描述为『罗汉』,并未提及周方的研究^[6]。不过周方的研究却得到了龙门石窟自五〇〇年左右确立的艺术传统的支持,当时龙门西山北段的大型皇室工程宾阳中洞开始动工。自此以后,主尊佛陀多胁侍二弟子:右胁侍为年轻的阿难陀,左胁侍为老僧迦叶。虽然两位胁侍均可归入一般范畴的『罗汉』,不过其特定身份有助于我们理解佛陀弟子图像中反映的不同特征及个性。

确认该迦叶头像的年代十分必要。一九六六年,松原三郎认为这尊头像为唐代作品(可能是在他拜访大都会时)。一九九三年出版的《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流失雕像集〉》亦将其断为唐代^[7]。不过也有其他学者持异议,指出这尊头像展现出北齐造像的典型特征。一九六五年,周方根据药方洞的北齐铭文《都邑师道兴造像记》,将头像断为北齐末年五七五年^[8]。还有部分学者将其推定为六世纪下半叶^[9]。周方用于对头像断代的北齐铭文,实际上提到的只是入口北壁的一座小龛。药方洞的开凿从北



(图四)
菩萨头像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擂鼓台中洞
唐代,约公元684~704年
石灰岩
高59.6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借展私人藏品。(196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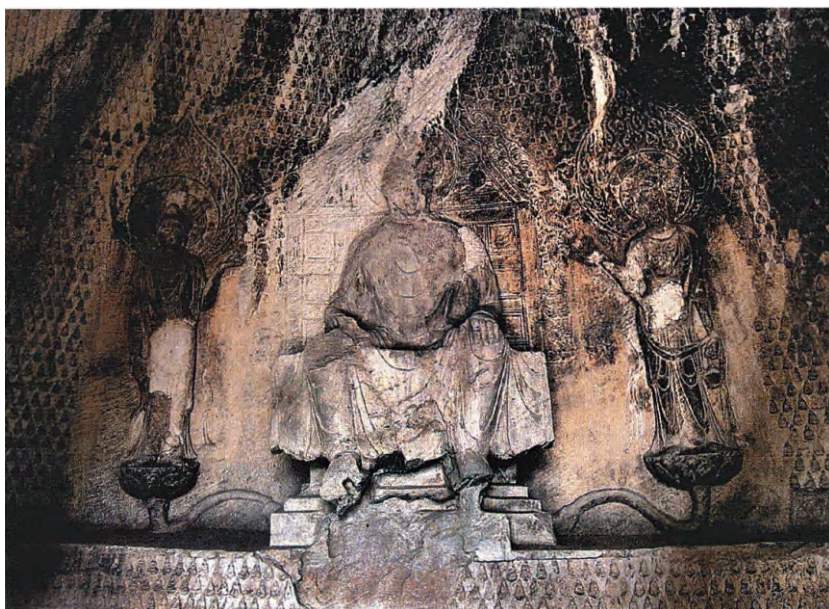


(图三)
佛陀及其胁侍像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
北齐,公元6世纪下半叶
石灰岩
(图片来自龙门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第2卷》,文物出版社,1992年,图144)



同迦叶头像的情形一样，通过观察样式与风格，笔者确认了另一尊头像的原始出处（图四）。这尊菩萨头像属私人藏品，曾借展给大都会。椭圆形的饱满面颊和耳垂下的两个小球状饰具有唐代菩萨的特征。头像略向右倾，表明菩萨原应立于主尊左侧。此外，头像以石灰岩雕凿，又使其与龙门相关联。笔者发现常盘大定和关野贞于五五三年间动工，五七五年前已经完成。

魏延至唐代。窟内最早的佛龛年代为五三〇年，开凿在南壁上。这就意味着为佛教信徒公开礼拜而开放药方洞的时间一定更早。窟内大规模的雕凿延续至北齐。西壁（正壁）的五尊造像很可能雕凿于五五三年以前。这一断代依据来源于洞窟北壁一座北齐小龛的铭文^[5]。亦即，这一工程含五尊造像，迦叶立像是其中之一，工程在五五〇（北齐建立）至五五三年间动工，五七五年前已经完成。



一九二六年前拍摄的照片中，有一张菩萨头像与此尊头像一模一样（图五）。该菩萨立于未来佛弥勒右侧，而该弥勒佛则位于龙门石窟东山擂鼓台中洞东壁（正壁）中央。现在该窟的弥勒佛头部为晚期仿品，其低劣的品相即为佐证。

东壁的弥勒佛及二胁侍菩萨是擂鼓台中洞的

下（图六）

弥勒及二菩萨像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擂鼓台中洞
唐代，约公元684~704年
石灰岩

（图片采自龙门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第2卷》，文物出版社，1992年，图256）

上（图五）

菩萨像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擂鼓台中洞
唐代，约公元684~704年
石灰岩

（图片采自 Tokiwa Daijō, Sekino Tadashi, Shina Bukkyō shiseki: vol 2, Tokyo, 1926-38, pl.74）



下(图八)
弥勒菩萨头像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
北魏,约公元493~504年
石灰岩
高34.9厘米,宽17.1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1941.98)

上(图七)
交脚弥勒菩萨坐像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
北魏,约公元493~504年
石灰岩
高45.7厘米,宽26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1939.190)

主要造像。南、西、北壁下部是一组二十五尊罗汉。这座洞窟原名『大万五千佛龕』,题于入口上方,得名于窟内四壁密刻的一万五千尊小坐佛。根据窟内壁下部铭文有用武周时期创制的新字体雕刻的情况,该窟可能开凿于此时期^[70]。老照片(见图五)和新照片(图六)中都表现了该菩萨立于主尊佛陀右侧,左臂下垂,持净瓶的方式与龙门唐代观音像颇似,进一步证实其年代应为唐代。

大都会收藏中有数尊雕像可追溯至龙门石窟,但无法确认其具体位置。有一尊被二狮胁侍的交脚坐姿菩萨像表现的是弥勒(图七),居于兜率天宮,将在未来娑婆世界降生成佛。弥勒头戴高冠,脸型及身躯修长,帔帛交叉于腹前,右手施无畏印,左

手垂于膝上。所有这些都是古阳洞上部所见北魏弥勒菩萨像的典型特征^[71]。这尊菩萨像的特征与四九三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至五〇四年宣武帝在位期间雕凿的弥勒菩萨像相似。早在一九四四年,大都会东方部策展人普爱伦(V. B. Pugh)就提出这尊雕像出自古阳洞^[72]。而据王振国称,古阳洞约有七十九尊弥勒菩萨像遭到毁坏,其中约有五十尊从洞窟上部完全被凿走^[73]。大都会藏弥勒像横跨其下方的两个拱形佛龕,但笔者并未发现古阳洞佛像的受损部位有与此弥勒像下部佛龕断面相合者。不过洞窟崖壁上部有少数几处崖体被毁严重,该弥勒菩萨的原初位置可能就在这些被毁崖面的某处。大都会的另一尊菩萨头像(图八),同样展



(图十)
浮雕立菩萨像
可能出自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
北魏, 约公元 504 ~ 534 年
石灰岩
高 59.1 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1948.182.4)



(图九)
浮雕立菩萨像
可能出自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
北魏, 约公元 504 ~ 534 年
石灰岩
高 55.9 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1948.176)

现了古阳洞崖壁上部的交脚弥勒像的典型特征。根据这尊头像高约三十五厘米的规格，可推测原来的弥勒像定比图七所示弥勒像体量更大。

大都会的龙门石窟藏品中还有数尊胁侍像。其中两尊立姿菩萨因为特征及体量相似（图九、十），很可能是某主尊佛像的一对胁侍。这两尊菩萨像均体型修长，方颐，戴三瓣花冠，有长帔帛交于腹前，下身着长裙，二像施相同手印，不过方向相反。所有这些均表现出古阳洞南、北两侧壁中部体量相似的立胁侍菩萨的特征。古阳洞侧壁中部造像雕凿于五〇四至五三四年间，年代晚于洞窟上部的大部分造像龕^{〔五五〕}。因此，这两尊胁侍菩萨像很可能是从古阳洞侧壁中部某处移走的，或出自龙门其他有类似雕刻风格的洞窟或崖壁。另一件胁侍菩萨残件带有初唐风格（图十一）^{〔五六〕}，有趣的是，其图像及风格特征，以及身躯的比例和体量，均与佛利尔美术馆的一尊立菩萨像极为相似^{〔五七〕}。大都会这件雕像的右手伸向左侧，表明它原来是立于佛像左侧。相反，佛利尔那尊雕像的姿势与此相同，但却用左手（详见本期第六十页图八），表明他是佛陀的右胁侍菩萨。由此可知，这两尊分别藏于大都会与佛利尔的雕像，应出自龙门石窟的同一佛龕或洞窟。还有一尊身形清瘦、腹部隆起的吹竽飞天像（图十二），很可能出自龙门北魏晚期的某座小洞窟顶部。



〔图十二〕
飞天
可能出自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北魏，约公元 504 ~ 534 年
石灰岩
高 22.8 厘米，宽 37.5 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1946.53）



〔图十一〕
立菩萨像残件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唐代，约公元 7/8 世纪
石灰岩
残高 47 厘米，残宽 34.3 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1940.173）

大都会藏品中除易于归入龙门石窟的雕像外，还有其他数件原来认为出自龙门，但需要再次检视，因为对图像及风格特征的研究已揭露出若干存疑的现象。一九一七年大都会在北京购买了一尊菩萨头像（图十三），脸型椭圆，弓眉修目，凝视下方，头戴三瓣花冠，花冠之间雕有两朵圆花。这尊菩萨被确认为观音，因其头顶冠上饰有一尊小佛，这是观音像的重要特征^[1]。其实，这尊头像的特征与古阳洞北壁中部右起第二龕的北魏晚期交脚弥勒菩萨像（现已佚）相似。这尊造像在沙畹著作中曾有收录^[2]。不过如插图所示，花冠间的圆花中心有圆形花蕊——此装饰不见于大都会所藏造像。另一疑问是关于三瓣花冠中瓣中间的小雕像。佛像结跏趺坐，双手置于腹前。身穿交领式大衣，如一条从双肩垂下的帔帛，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垂于足前，盖住双手。此外，佛像丰颐圆润。所有这些特征竟无一与古阳洞弥勒菩萨坐像头顶冠上的小坐佛相符。例如，古阳洞南壁中部左起第二龕中交脚弥勒菩萨冠上的佛像，双手明显施禅定印，所穿大衣双领向下延伸，具有北魏佛像典型的头大、身型清瘦特征^[3]。因此，大都会的这尊头像很可能是晚期模仿古阳洞南、北壁中部弥勒菩萨像原始头像的作品。

另一方面，在已有传统外可能存在例外。沙畹调查古阳洞时，北壁中部右起第三龕的坐姿弥勒菩



(图十四)
思维佛陀像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
北魏，公元6/20世纪早期
石灰岩
高52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1939.191)



(图十三)
弥勒菩萨头像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
北魏，约公元504~534年/20世纪早期
石灰岩
高54.1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1918.56.40)

萨头部已被移走^[212]。北壁中部右起第四龕的弥勒坐像头部同样也遗失了，而受损部位高约五十四厘米^[213]，与大都会这尊头像尺寸相符。遗憾的是，这尊头像并未出现在诸如沙畹、常盘大定等早期出版物中。因此，大都会这尊头像仍有可能是出自古阳洞这两座佛龕。

学者们对大都会一尊思维佛像的真伪存在不同意见^[图十四]。可能是其石灰岩质地和典型的风格，如椭圆形消瘦的面部、清瘦的身躯及密集的身体下半部衣褶纹，使其被鉴定为出自古阳洞六世纪早期的雕像^[214]。当这尊佛像在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日本佛教美术的源流』展览中展出时^[215]，很多专家对其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特别是日本东京成城大学的中国造像专家东山健吾（也称邓健吾），他认为此佛像出自二十世纪早期用龙门岩石制作、具有一般龙门风格的一组仿古造像。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佛教造像专家表明了相反的观点，部分认为其真实性毋庸置疑。

可能是其图像特征让部分学者将这尊佛像视为现代赝品。思维菩萨像是北魏常见的一种佛教造像题材，学者们至今对其也是如此定性的^[216]。不过这尊佛像的肉髻（象征智慧）和大衣的风格，在北魏晚期的佛像中很常见，它们是佛像的重要特征，不同于菩萨像。很可能半跏坐姿的思维菩萨、佛像

代表的都是觉悟成道前的思维悉达多太子像。相比于思维菩萨，思维佛陀可能意在强调悉达多的佛陀属性。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的太子半跏思维龕像（公元四九二年）是这一主题的佳例。此尊思维佛陀旁边有一马前腿跪地，表明悉达多已离开皇宫，开始修行生涯^[217]。日本大原美术馆收藏的雕于石碑（公元五二六年）上的另一尊思维佛陀，可能表现的也是类似场景^[218]。虽有少数几例存世，不过北魏时期对思维佛陀的描绘仍不同寻常，从而致使在龙门石窟找到一尊可供对比的造像非常困难。有趣的是，龙门石窟研究所有一尊据其声称出自龙门某窟的相似雕像^[219]。不过其真实性却有存疑，因为他们认为出自龙门的其他雕像同样也有非常见的特征。若能在龙门石窟找到一尊五六世纪相似的造像，或使用改良的科技追溯其源流至龙门，笔者相信大都会思维佛陀的真实性是可以确定的。

除图像特征外，雕刻痕迹也能帮助鉴别原属龙门的雕像。一尊浮雕的交脚弥勒肋二狮像^[图十五]被认为是龙门石窟五世纪晚期或六世纪早期的作品。其坐姿、手印及服饰，胁侍的动物及造型清瘦风格，都让学者们想起古阳洞的北魏交脚弥勒菩萨像。不过这尊弥勒像的冠顶部并无装饰，相反，在冠正面上缘可见一个半月形图案。冠中间的小坐佛以一种不常见的方式双手施禅定印。小坐佛所在的尖拱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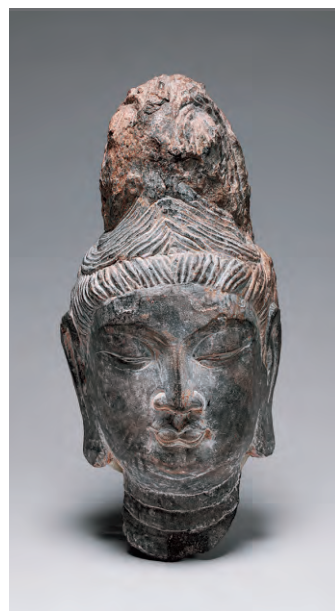
(图十五)
交脚弥勒菩萨与二狮像
公元 20 世纪早期 (?)
石灰岩
高 45 厘米, 宽 34.9 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1985.214.139)

龕兩側是兩個花瓣，但它們與彌勒頭冠常飾的忍冬花或圓花不同（如古陽洞所見）。此外，該像身上還可見到未拋光的刻痕。這些特征表明其雕刻年代要晚得多，可能是二十世紀早期，而不是一千五百年前。同樣，另一尊头像也包含了一些唐代龍門菩薩的特征（圖十六），雕刻所用的石灰岩在龍門山也能發現，但沒有唐代菩薩常戴的耳飾。脖子上的線條雕刻並不熟練，還有新刻痕迹。

最後介紹大都會收藏的另几尊據傳出自龍門的雕像。有一尊立菩薩（1914.78）模仿了唐代的若干風格特征，頭部向右傾斜，向下凝視^[25]。菩薩戴『U』形長瓔珞，左手持長莖蓮花。我們在龍門石窟無法找到類似的唐代菩薩像，這引起了筆者對這尊雕像真實性的疑問。另一尊北魏晚期風格的佛陀头像（1912.536）是真品，可能是從龍門某窟移走的。头像由灰色石灰岩雕刻而成，但其類型與龍門發現的有所不同。此外，這尊头像的特征表現出了與河南巩縣（今巩义市）石窟造像更高的相似性^[26]。有一尊頭頂束发的击鼓舞人雕像（1932.1740），表現了五世紀晚期樂師的典型特征，與山西大同云岡石窟所見有關。龍門北魏洞窟中此類舞人的缺失否定了它的龍門出處，而巩縣石窟窟壁下部某些樂舞伎像被移走的事實，引發了關於這尊造像出自巩縣石窟或其他河南北魏石灰岩洞窟的推測。大都

會藏的一尊弟子头像（1912.510）^[27]和一尊佛头像（1930.38）均為圓雕石像。雖然其真實性無人懷疑，但它們一定不是出自龍門石窟。

雕凿于北魏晚期至唐代早期的龍門石窟，代表了中國佛教藝術繁榮時期的都市風格。遗址内现存造像的特征，是鉴别据传出自龍門石窟雕像的标准。由于文献记载有限，如若无法确定某尊造像的原初位置，那么将其研究细化至一个可能的出處亦十分必要。另一方面，厘清据传出自龍門的存疑雕像的周边环境，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件作品的特殊性。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是筆者继佛利尔美术馆后展开龍門石窟雕像研究的第二家西方博物館。筆者相信，我們掌握的原屬龍門雕像的信息越多，就越能清晰地显现石窟寺的原初面貌。而溯源西方藏品中的雕像正是這項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译者：白杨）



（圖十六）
菩薩头像
公元 20 世紀早期（？）
石灰岩
高 24 厘米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1921.175.406）

注释

- 〔一〕 CHANG Qing. Search and Research : The Provenance of Longmen Images in the Freer Collection[J]. ORIENTATIONS, 2003(May):16-25.
- 〔二〕 CHAVANNES E E.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M]. Paris, 1909, plates part I: nos278-398.
- 〔三〕 CHOW Fong.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J].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1965, 18(May):318.
- 〔四〕 龙门石窟研究所, 编. 龙门流失雕像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3: 119.
- 〔五〕 龙门石窟研究所,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编. 龙门石窟窟龕编号图册 [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4.
- 〔六〕 Nara National Museum, ed. Nihon no Bukkyō o kizuita hitobito: sono shōzō to sho[M]. Nara, 1981:cat.no.195.
- 〔七〕 龙门石窟研究所, 编. 龙门流失雕像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3: 78.
- 〔八〕 CHOW Fong.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J].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1965,18(May):318.
- 〔九〕 Nara National Museum, ed. Nihon no Bukkyō o kizuita hitobito: sono shōzō to sho[M]. Nara, 1981:198.
- 〔十〕 常青. 龙门药方洞的初创和续凿年代 [J]. 敦煌研究, 1989 (1): 40-41.
- 〔十一〕 阎文儒, 常青. 龙门石窟研究 [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 123-124.
- 〔十二〕 DAIJŌ T, TADASHI S. Shina Bukkyō shiseki: vol 2[M].Tokyo, 1926-38: pls48-67.
- 〔十三〕 PRIEST A. 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M]. New York, 1944:26.
- 〔十四〕 龙门石窟研究所, 编. 龙门流失雕像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3: 125.
- 〔十五〕 CHAVANNES E E.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M]. Paris, 1909, plates part I: nos278-398; 刘景龙, 编. 古阳洞: 第1册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136.
- 〔十六〕 PRIEST A. 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M]. New York, 1944:39.
- 〔十七〕 CHANG Qing. Search and Research : The Provenance of Longmen Images in the Freer Collection[J]. ORIENTATIONS, 2003(May):18:fig.4.
- 〔十八〕 PRIEST A. 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M]. New York, 1944:25.
- 〔十九~二十一〕 CHAVANNES E E.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M]. Paris, 1909, plates part I :no.371, 387, 372.
- 〔二十二〕 龙门石窟研究所, 编. 龙门流失雕像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3: 126.
- 〔二十三〕 PRIEST A. 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M]. New York, 1944:26.
- 〔二十四〕 Nara National Museum, ed. Nihon Bukkyō bijutsu no genryū[M]. Nara, 1978:47.
- 〔二十五〕 PRIEST A. 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M]. New York, 1944:27; Nara National Museum, ed. Nihon Bukkyō bijutsu no genryū[M]. Nara, 1978:47, 318.
- 〔二十六、二十七〕 SABURŌ M. Chūgoku Bukkyō chūkoku shiron[M]. Tokyo, 1995:pl.99a,189c.
- 〔二十八〕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 中国美术全集: 雕塑编·11: 龙门石窟雕刻 [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 49.
- 〔二十九~三十一〕 PRIEST A. 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M]. New York, 1944:40, 27-28, 27.

参考文献

- 〔一〕 龙门文物保管所, 编. 中国石窟: 龙门石窟: 第2卷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2.